

· 百 家 园 ·

王清任“方效论错”管见

李 晴 陈利国*

暨南大学医学院中医系,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大道西 601 号, 510632)

* 通讯作者: tchenly@jnu.edu.cn, (020)85226476

[摘 要] 通过考查王清任《医林改错》中有关理论与《黄帝内经》之间的联系, 阐述了其“方效”之解, 运用发生学方法和进化论的观点探寻“论错”之源。提出中医学理论体系对王清任“论”的不可同化性直接导致其被贴上“错误”的标签, 而他在遣方用药时对传统中医理论的灵活运用, 又使其活血化癥方药取得良好的临床疗效。

[关键词] 王清任;《医林改错》;发生学;进化论;方效论错

清代医家王清任所撰《医林改错》记载了其访验脏腑 42 年及临床所获实践经验。他所创立的一系列活血化瘀方剂, 是该书最为世人称道之处。然而与书中所载活血化瘀诸方在临床上得到广泛运用而不相匹配的脏腑学说, 却备受争议, 其立论之本旨——“非治病全书, 乃记脏腑之书”, “改错”者, 改脏腑解剖之错也, 被后人“越改越错, 错上加错”, ……种种训斥折射出方剂与理论归属的天壤之别, 理论与实践的相互脱节, 以及后世对王清任的看法与王清任指责前人处方有效而理论错误(即“方效论错”)[1]论调的巧合等现象。以下就王清任“方效论错”这一表象做一简要分析。

1 “论错”之源

恩格斯提出, “自然界不仅是存在着, 且是生成着并消逝着”。揭示了自然界是发生发展并演化着的, 处于永恒运动变化的过程中, 除此再无永恒之物, 有着时间上的历史。

而发生学正是这样一个把历史的观点带进研究对象的研究方法与范式, 它从自然科学“嫁接”到人文科学, 是反映和揭示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形式发展、演化的历史阶段、形态和规律的方法。其主要特征为: 把研究对象作为发展的过程进行动态的考察, 用观念来推理事物的阶段性过渡, 注重考察历史过程中主要的、本质的、必然的因素, 强调知识结构生成的过程(即事物从一阶段过渡到另一阶段)。具体到中医学, 则是反映和揭示中医理论的发生、发展及演化的历史进程以及规律的方法, 其核心是撇开现代中医学的影响, 把中医的理论归置于其发生发展的特定历史条件下, 从中医学理论得以发生发展的具体历史环境进行考察, 重点放在中医理论赖以发生发展的整个过程中主要的、本质的、必然

的因素上, 尤其是独特的方法因素, 最终实现对中医学认识的返璞归真[2]。

据此, 有必要运用发生学方法对王清任的学术源头与学术背景进行阐述, 将其学术思想置于培育它的环境中观察, 亦谓追其本, 溯其源, 探其真也。

王清任生活的时代(1768—1831)正处考据学兴起和鼎盛的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对宋明理学广泛深入持久的批判之风, 形成了清代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怀疑否定的批判精神、敢于超越前人的创造精神。生活于这一时期又地处学术政治中心的北京, 王清任应是深受考据思潮、实事求是学风的熏染影响, 尤其是方法学的更新给予他重大冲击启发, 使其对前人论著产生怀疑, 敢于采用新方法对前人论述进行审视。《医林改错》重形态解剖、形态医学、临证实践, 正是嘉乾时期学风的具体体现, 他在解剖学等方面的成绩很可能正是应用考据实证方法的结果[3-4]。

王清任的探索创新精神为后人所颂扬, 立为楷模, 但其所创造的脏腑理论却未被中医学理论体系接纳, 原因何在? 这仍要回归当时的中医文化背景去考察。科学理论是一个有结构的系统整体, 由硬核与保护带组成。“硬核”是理论的基本假设、核心部分, 不容反驳。“保护带”由一些辅助假设和初始条件组成, 可适当调整或变动, 以对付“反常”情况的挑战, 保护硬核免受侵犯。与此相类似, 虽然中医在当时并未形成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科学精神从来是微弱的, 但它在朦胧中或多或少地遵循着这一规律, 所用的方法无形中暗合了科学的方法。

中医系统是适应整个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的产品, 它同时又构成了其体系内外新类型信息的选择

环境。只有适应这个体系特点的新信息,才能得到它的认同,破坏这个体系特点的新发现都是不被允许的,因为这样的新发现不仅要冲击这个体系的完整性,而且其可能的发展还进一步威胁着整个文化背景的生存。基于这样的分析,王清任的脏腑学说被迫“流产”就不再是一个难以理解的问题了,这恰是合乎文化进化规律的事情,从中可找到必然的历史原因。

王清任的发现与中医系统存在内在本质的深刻冲突和矛盾,不能调和,具相互否定的性质。他的论断动摇了中医体系存在的根基,侵犯了其理论“硬核”——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王清任曾大声疾呼:“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业医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虽其解剖学并不完善,更存在大量错误,但有价值的是其前进的方向。若中医体系能按此发展,必将呈现另一派景观。自由能孕育文化,而文化的格局类型一旦形成,要逐渐树立唯我独尊的绝对统领,就又会产生不自由和排他性^[5]。于是历史的进化机制并未给予王清任的学说自由发展的机会。

中医体系通过取象比类和取数比类等方法曾有效整合同化了许多发明发现,诸如各种疾病的特异表现、生理病理现象、药物的特定功效等,为什么对王清任的学说却失去了以往的同化功能?在于以往的发现只是作为结果而无具体客观实证过程,若仅仅是结果,就允许和可能被中医体系利用来做合乎自身需求的理论说明。但王清任的发现却不是,它们清晰明白,又不允许更改实证过程,如他在书中评议张仲景的小柴胡汤神效,而归于足少阳胆经证则是论错,王清任对他认为的前人的“方效论错”做了详尽的个人观察所得的解剖证明^[6]。其解剖所见与传统中医“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的学说存在天壤之别,挑战中国传统文化道德底线,动摇其根基,直击“硬核”,遭口诛笔伐是意料之中的事。既然他的发现与中医体系矛盾冲突,又不允许被同化,下场就只能是遭排斥。此时中医体系的自我保护机制顽强地发挥作用了,为了维持体系的生存与稳定,它以强大的力量,排挤王清任的“异端学说”。

中医这一根植于传统文化土壤的奇葩,带着浓郁的感性、人文、思辨的气质。它强调的是人伦本位,重视的是人际道德关系,讲究的是“重道轻器”。在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中,王清任企望扭转“上守神,粗守形”的传统信条,把理论建立在形态解剖基础上

的务实精神,无疑是破坏传统的“怪物”。

虽然文化不总是优胜劣汰,但它必是适者生存。至此,通过还原王清任理论的孕育发生土壤,运用发生学方法论和进化论的观点,探究了其论错之缘由。

2 “方效”之解

而方效者,皆因虽则王清任的解剖认识“离经叛道”,但其施治用药仍与中医经典的辨证论治“殊途同归”,走的仍是一条师承、遵循传统中医“理法方药”之路。仅以医家们奉为圭臬的《黄帝内经》为参照,试举例说明二者契合之处。

2.1 对气血的重视

《黄帝内经》对“气”与“血”给予了极大的关注^[7],如《素问·调经论》云:“人身所有者,血与气耳”,“五脏之道,皆出于经隧,以行气血,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素问·八正神明论》云:“血气者,人之神,不可不谨养”。《素问·至真要大论》云:“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必先五脏,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审其阴阳以别柔刚,阳病治阴,阴病治阳;定其血气,各守其乡;血实宜决之,气虚宜掣引之”。等等不一而足。论述了气血在人体生理、病理上的重要性,也提示了治疗时的着力点。

而《医林改错》一书特点是“补前人之未及,而在气虚、血瘀之症为多”,细细品味,其立论基础仍未超越《黄帝内经》,著作中显示了对气血很好的继承重视,如“治病之要诀在明白气血,无论外感内伤,要知初病伤人何物,不能伤脏腑,不能伤筋骨,不能伤皮肉,所伤者无非气血”;“气有虚实,血有亏虚”;“血尽气散,故死之速”;“亏损元气,是其本源”;“气通血活,何患病之不除”。他的这些精彩论述,正是对《灵枢·九针十二原》“通其经脉,调其血气”;《灵枢·平人绝谷》“血脉和利,精神乃居”等原则的具体发挥和升华。另王清任指出:“半身不遂,亏损元气,是其本源”。与《灵枢·刺节真邪》“虚邪偏客于身半,其入深,内居营卫,营卫稍衰,则真气去,邪气独留,发为偏枯”。《素问·生气通天论》“有伤于筋,纵,其若不容。汗出偏沮,使人偏枯”也是渊源相承,二者均把“中风”机理归结为“气虚”,且王清任还通过量化元气,浅显地阐释中风的发生:“若十分元气,亏二成剩八成,每半身仍有四成,则无病。若亏五成剩五成,每半身只剩二成半,此时虽未半身不遂,已有气亏之症……若右半身二成半归并于左,则右半身无

气……”。王清任对《黄帝内经》中的气血思想心领神会,在治疗半身不遂时,紧紧抓住气虚这个关键病机,重用黄芪,竟达 120g,意藉黄芪枯木回春之功。王清任的气虚血瘀之说至此又深化延展了《黄帝内经》的认识。

虽然王清任所指“瘀血”“血府”等均为肉眼观察,“实证”所得,但其对气与血的重视同样溢满字里行间。然“气”视之不可见,扪之不可得,王清任何曾考究、怀疑过这一无形之“气”?可以说他欲“唯物”而未遂,离经叛道却殊途同归。皆因王清任对传统中医气血概念的笃信与不自觉的运用^[8]。

2.2 对瘀血的认治

瘀血学说是王清任在病理学上的巨大成就,由他独创的系列活血化瘀方剂更是功效卓著,可谓源于《黄帝内经》,独有建树。《黄帝内经》重视去恶血,即祛瘀,“坚者削之,客者除之,……结者散之,留者攻之”;列有瘀血痹证、痛证、厥证等多种病证,提出“血实宜决之”,《素问·针解》亦明确提出“菀陈则除之者,出恶血也”,都是强调瘀血宜祛;《黄帝内经》中屈指可数的方剂之一:四乌贼骨一芦茹丸,由茜草、乌贼骨、鲍鱼汁、雀卵组成,既是用于治疗血枯经闭,有温经补肾、活血散瘀之功。

王清任云:“血受寒则凝而结成块,血受热则煎熬成块”;“蕴毒在内,炼烧其血,血受炼烧,其血必凝”。认为瘀血成因广泛、存在普遍,受寒受热受蕴毒灼炼均能导致其产生。他不仅重视瘀血病机和祛瘀,在具体方法上还多有发挥。如王清任用于气虚血瘀证的“补阳还五汤”立法即合拍于《黄帝内经》“凝涩者,致气以温和之,血和乃止”。意为大补元气,使气旺则血行,血行则瘀自消。再如,《素问·缪刺论》刺左角发,饮酒的方法以治尸厥,其病机在于瘀血阻于头脑,脑窍闭阻而致。而王清任治疗头面四肢,周身血管血瘀之经典方——通窍活血汤,内含君药麝香开通走窜,力行血中瘀滞,开头面四肢经络之壅遏,辅以黄酒、鲜姜、老葱,引大队活血化瘀之红

花、赤芍上行、发散、透达全身,增强活血通经辛散通阳之效,与《黄帝内经》治疗尸厥之法不无相合处。

3 结语

“方效”与“论错”,二者看似命运走向分道扬镳,理论与方剂背道而驰,貌似不失为“废医存药”等声音的佐证。然而通过上述分析可得出,这恰恰是中医强大的“排除异己”功能在发挥作用的结果,它不允许王清任关于脏腑的异端学说生存于世,却还是同化吸纳了其系列方剂。换种说法,王清任欲唯物而未遂的脏腑理论,并不是实质孕育他诸多功效卓越方剂的土壤,仍是传统中医经典理论的“润物细无声”带来了王清任方剂的茁壮成长、流芳百世。在“废医存药”和“中药西制”这两个目前很具代表性的中药现代化倾向的声浪里,也许应该冷静地思考、辨析中医理论与方剂的联系和归属,站在弘扬民族文化的高度看待中医药目前的困惑,相信对中药产业发展、中医药现代化、中西医结合的科研道路均有启示作用。

参考文献

- [1]王清任. 医林改错[M]. 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9:57-59.
- [2]李如辉. 中医理论的发生学研究[J]. 浙江中医学院学报, 1999,23(2):1-3.
- [3]林延清. 清史纪事本末. 第六卷. 嘉庆朝[M].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6:2071.
- [4]吴振清. 清史纪事本末. 第七卷. 道光朝[M].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6:2436-2445.
- [5]季国清,刘啸霆. 重建科技哲学关于科学技术的发生学与哲学研究[J]. 哲学动态,2003,(3):23-27.
- [6]王清任. 医林改错[M]. 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9:57-59.
- [7]潘大为. 王清任“方效论错”原因初探[J]. 中华医史杂志, 2006,36(3):177-181.
- [8]温长路. 王清任对《黄帝内经》的继承和发挥[J]. 河南中医,2002,22(1):3-7.

(收稿日期:2011-02-10;修回日期:2011-05-23)

[编辑:李 巍]

“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新解

张卫国* 赵 丽

行唐县中医院,河北省行唐县衡阳大街1号,050600)

* 通讯作者:xtzyyzwg@sina.com,13111582702

[摘 要] 认为“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之“作”通“祚”,祚强,指国祚强盛、源远流长。伎通“技”,技巧,指推陈出新。因此,意为:肾者,乃是掌管国运命脉,使国祚昌盛、源远流长,推陈出新的器官。

Copyright © 2011 China Academic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